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刘成才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 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 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可以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 触摸到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 “十七年文学”; 城市; 想象;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3-0017-05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3.004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以“海派”和张爱玲为代表的城市文学, 在 1949 年以前的中国, 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取得了重要成就;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城市生活的消隐, 城市文学在“十七年”间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这已经是学界的定论^①。其实, 在“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也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着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想象, 只不过这种城市想象采取了变形的策略。同时,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 这种想象才显得非常微弱, 微弱到了被遗忘的程度。

本文以“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和沈西蒙《霓虹灯下的哨兵》^②为例, 分析“十七年文学”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

一、发现城市, 欲说还休

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几个中心城市兴起发展的, 并在 1940 年代的上海真正具有了所谓的“都市品格”。作家们已经由最初的厌恶恐惧转换到对城市的欣赏与享受, “城市不再简单的背负本民族受辱的重担, 城市不仅仅是历史的鞭笞物, 而是独立的真正成为审美的对象, 可供品味”。同时, “都市生活也是每日每时发生在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家庭这个都市细胞的内面, 是日常生活, 是浮世的悲欢”^[1]。这种态度, 也影响到了对城市文学的研究, 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开端和成果, “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是带着‘享受’的态度研究上海的”^[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有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 彻底地扭转了人们对城市文学的认知态度。一是有关“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争论, 二是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收稿日期: 2008-10-27

作者简介: 刘成才(1976-), 男, 安徽蒙城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参见: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 [M]. 毛尖,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吴福辉. 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② 参见: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J]. 人民文学, 1950, 1(3).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8. 沈西蒙. 霓虹灯下的哨兵[J]. 剧本, 1963, (2). 下文论及这三部作品的均出自以上版本, 不再一一注出。

的批判。

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刚结束,在刚复刊的上海《文汇报》上就爆发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作为作品主角的争议。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文艺的表现对象问题,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建国初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有过一段时间的共识^[3],人民的内涵中也包括着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场争论的挑起者洗群被批判为“为保卫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在文艺上的地位而战”,是“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一种含有阶级性的抗拒”^[4]。由于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生活都在城市,如果他们能够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那么,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随着争论的最后定性,城市生活也就错失了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现身的机会。

1950年,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这是当代文学中最早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反映的是城市人“我”和贫农妻子随革命大军进到城市以后对城市生活的不同感受和态度。

小说中的“我”进城以后,对城市里的一切都感到特别亲切,“那些丝质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这一切,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妻子对一切“看不惯”,“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还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而在小说最后,出身贫农的妻子似乎也渐渐地认同了城市生活,“她还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是集会,游行时就穿上,回来,又赶忙脱了,很小心的藏到床底下的一个匣里”。这时“我忽然发现她怎样变得那样美丽了啊!我不自觉地俯下头去,吻着她的脸……”

作品不仅仅写了妻子被城市的改造,更要命的是,作者还以赞赏的语调写了她的被改造。这种对城市生活的熟悉与享受,对“旧城市”的迷恋,在当时是“革命意志衰退”,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腐朽”的,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被批判为“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作者因为“自己身上所言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作品也就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5]。

当时那场能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彻底否定了代表城市文化的小资产阶级在文学作品中的合法性,也排除了城市文学出现的几率;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又彻底驱除了对城市描写中的欣赏甚至赞扬的态度。于是,对城市描写的态度慢慢地也就集中到国家所规定的意识形态上了。

二、日常生活,变形登场

对城市生活的拒绝与否定性评价,其实也反映了胜利者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城市这巨大的胜利品时,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自豪、疑虑、甚至恐惧互相交织。“一部分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产生对胜利光荣与对环境厌恶以及好奇与自卑的矛盾心理”^[6]。而在对城市生活熟悉的一部分人那里,城市生活却是光怪陆离、充满色彩的。这时,城市及其生活情调便借助于革命文学的形式再次出场,从而获得了新生,这以表现城市日常生活的《上海的早

晨》为代表。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能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异数与另类，因为毛泽东早在1925年就已经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7]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作品资本家形象的要求。

实际上，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内在的复杂性与多重角色，以之为主角的作品更容易展现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人物也更容易出彩。

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主角来刻画的作品而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仅有《子夜》和《上海的早晨》。《上海的早晨》的作者主观上是想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工人们最后的斗争胜利。作家也完全是在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规范下来结构作品和展开叙事的，弥漫于作品中的强势话语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痛斥着商品交换的法则，否定着货币的职能与功用。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能够从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日常化描写中，看出作家对城市生活的内心隐秘的态度。

小说的名称，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与《子夜》联系在一起：“二十多年前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命运，已经有了《子夜》的反映；今天有谁能来写一部反映新的时期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新的命运的作品呢？”^[8]这就是《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采用的是日常生活化的眼光，这种眼光本来是不承担意识形态的训诫功能的，但在作品中硬是从普通的情节与平凡的人物中提炼出符合意识形态主流的宏大意义。

小说对徐义德、朱延年在生活中的奢华放纵，徐家太太的争风吃醋以及男女之间的男欢女爱，徐义德书房的“雅致”的描写，表现了色彩纷呈、千姿百态的现代大都市生活。透过这些，我们似乎看不到作者对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所谓城市生活的厌恶与批判，从小说的描写中反而透露出作者对城市生活几丝欣赏乃至羡慕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情调，它以幽灵般的隐晦的形式出现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城市及其生活情调附身于革命而出场，革命要颠覆旧城市的统治者，要改造旧城市的社会，城市以其幽灵化的形式模仿死亡从而获得新生”^[9]。

三、提高警惕，再演变形记

《霓虹灯下的哨兵》发表于《剧本》1963年2月号，反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在解放上海之后，接受了警卫上海南京路的光荣任务，受到上海城市生活的腐蚀，通过教育，战士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毒害，决心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城市生活以妖魔化的身份，在批判性话语的外衣掩盖下开始了自己的再度变形登场。

刚进上海，接管者就被警告：“我们解放军除西藏之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就被人打倒在地上。……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在城市我们可能要上当，要谨慎才好。”^[6]

《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重点描写了这个城市的进入者在城市所面对的妖魔化吸引与诱惑，

这时,对城市的想象就再度上演变形记,城市想象借助批判的话语再度登上了“十七年文学”的言说空间。

上海兵童阿男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参加游园大会,陪女同学到国际大饭店吃饭,频繁进入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国际饭店、咖啡馆和跳舞厅;三排长陈喜则放松了警惕,受到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忘记了我军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扔掉了有补丁的布袜,还说班长赵大大“黑不溜秋靠边站”。妻子春妮从乡下来部队探望他,他却嫌弃妻子太土气,跟不上潮流,也逐渐认同了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

但是,这种对城市生活想象的“非法性”是确定无疑的。剧本中的城市想象是作为明确的不健康的甚至是危险的苗头去描写的。于是,作品正面塑造了指导员路华和连长鲁大成的光辉形象,突出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消灭了不健康和危险的苗头,使战士幡然悔悟,从而凸显了“拒腐蚀”的时代主题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即便如此,观众还是在批判性话语的掩护下,通过《霓虹灯下的哨兵》完成了对城市的想象性认知与启蒙。

四、结 语

通过对以上三种代表性作品城市想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十七年文学”中,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渐强大,城市想象的言说逐渐萎缩,不得不采取变形的策略,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张爱玲的那句话:“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10]对这一点的认识,我们的文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走了很多弯路。

直到20世纪末,当城市文学作品在文学中大量出现,当平民日常琐碎的生活越来越多地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对象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们用极其崇高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代进步或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11]。

参考文献

- [1] 吴福辉.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 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J]. 文学评论, 1994, (1): 5-17.
- [2] 程光炜. 文化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C] // 程光炜.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11.
-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6-66.
- [4] 朱寨.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44.
- [5] 丁玲.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J]. 文艺报, 1951, 4(8): 7-10.
- [6]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档案馆. 接管上海: 上卷[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60.
- [7] 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C]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
- [8] 王西彦. 读《上海的早晨》[J]. 文艺报, 1959, (13): 15-22.
- [9] 陈晓明. 城市文学: 无法现身的“大他者”[C] // 杨宏海. 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41.

[10]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C] //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1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3: 281-288.

[11] 唐小兵. 蝶魂花影惜纷飞[J]. 读书, 1993, (9): 105-110.

Imagination of City in the 17 Years Literature

LIU Chengcai

(School of Humanit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215123)

Abstract: As to imagination of city in the 17 Years Literature, the description of it changed from the obscure method to distortion. Finally, the description of it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city daily life. In this paper, three representative works were selected to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17 Years Literature's city literature, which was called the depth stream of static water. By this means, the obscure but definit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ity liter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Key words: The 17 Years Literature; City; Imagination; Daily life

(编辑: 刘慧青)